

柳叶刀 与 武士刀

刘士永
著

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

增订本

溯源与流变 ★ 交锋与转化 ★ 名门与正宗 ★ 瑜亮之争 ★ 流转与离乡 ★ 弦尽音未竟

中西書局

柳叶刀 与 武士刀

刘士永
著



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

增订本

中西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 / 刘士永著. —增订本. —上海：中西书局，2018.1

ISBN 978 - 7 - 5475 - 1325 - 5

I. ①武… II. ①刘… III. ①医学史—研究—日本
IV. ①R - 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7673 号

武士刀与柳叶刀

——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增订本)

刘士永 著

责任编辑 应敏燕 伍珺涵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57 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1325 - 5 / R · 009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 - 65315462

自序(初版)

不论从源流抑或形制上来看,武士刀与柳叶刀都应该毫无关系,自然在社会意涵与文化象征上也无所交集。然而,西洋医学传入东亚社会的历史过程,向来是学界注目的议题。有鉴于国内学者精研中国,包括台湾之事例,而日本亦为东亚地区医学西化的先声,且下启台湾医学发展之滥觞,笔者酌以本书勾勒西洋医学在日本之递嬗,并及于尔后之形变与扩张。本书写作之起心动念,深受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James Bartholomew 教授的著作影响,拟从社会结构(social formation)演化的角度,连结幕府时代封建身份制度、百年传承的武士家风及严格伦理规范,与明治初年日本对西洋医学接受及快速形变之因缘。尽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主流逐渐向西方标准靠拢,但沿袭自幕府时代留下的武士社会特征,仍旧在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医学上刻下许多历史的烙痕。本书落笔初衷则希望在近世中、日现代化比较之外,另辟观察之蹊径。易言之,如果只从事后成败论的观点来说,由民族或社会价值差异性论断中、日现代化之成败,或许是一个便捷且能满足舆论心态的角度;然而这般说法却不能完全指出医学在中、日社会中的价值有何根本之不同,以及同属东亚儒家社会的晚清与幕府社会,对西洋医学的反应又为何会有所差异。是故,写作本书之目的,不在于论断东亚儒学与日本现代医学源流,谨望为科技中心论或实用主义所影响之东亚现代医学史观,提出一点带些文化趣味的看法与分析。

笔者自 2009 年出版专书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以来,陆续接获各种书评、建议与私下讨论。有一篇 2011 年发表于 *Japanese Studies* 3 卷 3 期上的书评,评者认为书中涉及西洋医学在日本

形变的部分,值得另以专书深究之(worthy of an entire book on its own)。此语事实上也应和了笔者撰写该英文专书时,为切合题旨忍痛删减部分论述与材料时的心情。然而,若非2008年有幸参与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活动,原本的专书计划或将充满医学技术与相关术语,全然忽略“人”在其中的角色,更遑论文化与传统在日本西洋医学里印刻的足迹。在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期间,笔者才开始有机会在张昆将教授亦师亦友的引导下,将研究的触角伸往更深层的江户社会、儒学与武士道的演化,略为参透过去仅能意会却难以明说及解释的现象。笔者于2009年台大主办的“东亚视野中的日本武士道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及尔后数度公开演说、报告该论文时所博采到的各方建议,约莫可视为这本小书之源头。其中,书稿涉及1894年香港鼠疫与1896—1897年台湾鼠疫争论者,曾于2010年3月假美国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夏威夷年会时发表,幸蒙庆应大学铃木晃仁教授、大阪市立大学胁村孝平教授与旧友青山学院大学饭岛涉教授提携,解决了日本洋医界的人际网络与知识流通特质的疑惑,书稿雏形终于在2011年底方得以浮现。2012年全书定稿后共计六章,结构安排依时叙事且援事为纲,分别起自背景介绍之首章“溯源与流变”,其次依序为第二章“交锋与转化”,第三章“名门与正宗”,第四章“瑜亮之争”,第五章“流转与离乡”,与终章“弦尽音未竟”。全书略论日本西洋医学之文化特质与医学争议,点明日本洋医界之文化及社会传承,侧写与殖民地西洋医学发展之关系。笔者盼以此书呈现幕末侍医门风在明治医学现代化中的演化,并展现部分日本现代医学发展里的文化与传统特质。

尽管笔者资质驽钝,以至于本书篇幅有限且部分论述不过泛泛而已;但书稿历经师友之提点与匿名审查人精辟建议的调整,终能稍稍补偿先天不足,得在“东亚文明丛书”系列里滥竽充数。就是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受益多方,因此当笔者最后校阅书稿时,不由得笑拟拙著是“丹麦三明治(Smørrebrød)”——一种由隔夜菜改良而来的丹麦风味食品,虽不尽然能登大雅之堂,但仍自有其风味。一如笔者访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时,得以从容悠闲地完成英文专书初稿;此次能完成拙著,笔者须感谢

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storical Research)的支持。2011年9月获选为该中心资深研究员以后,主任 John Brooke 教授宽容地允许笔者专注于书稿之修改,甚且代为接下许多中心的琐事。如果没有他、Christopher Otter 以及 Philip Brown 等人相助,这书稿或许迄今仍在修改中。至于语文上的协助,台湾东华大学郭俊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市川智生教授都不吝于伸出援手,笔者在此一并致谢。若说本书还有一些值得翻阅的地方,真的要衷心感谢上述所有单位的支持与学界同仁的无私,让笔者英文专书未能详论的“前传”得以面世。笔者职务所属之“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也在研究空间与材料上提供莫大的助益。书中部分内容亦曾于台史所讲论会上发表,同事的批评与指教都是增艳本书之处。家人的支持,从来就是研究写作上最无形却也最关键的支柱。他们的名字虽不在本书中出现,身影却满布在字里行间。

刘士永

2012年2月序于南港

再序(增订本)

自从《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于 2012 年在台湾出版以来,受到各界诸多方家以及读者的提点和互动,笔者既感受良多,也自觉该寻求补正与扩充之机会。且不论各方温暖与支持的话语,对于初版的建议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书写体例可以更向学院式的笔法修正;另一则是 20 世纪初期的日本经验如何与今日的情况相容。对于第一个意见,笔者先前已自称资质驽钝,不敢妄攀骥尾,且写作初衷本意即在抛砖引玉,期待各方意见提携笔者自我成长的机会。对于这样的写作策略,笔者自忖医学史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如果能吸引不同专业背景的读者参与,或许也是培育自我与推广学科的机会。基于相同的理由,这次的增订本暂且不改变初版时的笔法,仍希望透过比较易于阅读的书写,让学术象牙塔以外但仍有专业背景的读者,能够一同来参与本书的讨论。因此对于第一个建议,增订本的写作方式怕是要让某些学界前辈及先进失望,但笔者仍诚挚期待他们的谅解及包容。

至于第二个建议,则恰与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兴趣相符。在过去的三四年中,笔者的研究焦点逐渐转向近代殖民医学本质的定义以及冷战时期国际卫生网络之建构上。两者都指向某些缘起于西方医学史的议题: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国际卫生(international health)在东亚地区运作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如何连接至日本早期的西医化历史经验中。于是,如何将新生的资料与心得连接至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寄已知的历史脉络于未知的新议题上,不免令笔者过去数年中时时心有所系。因此,当上海中西书局李碧妍女士提出发行简体版的要求时,即请求她能同意笔者对原书内容作必要之修改与增补。虽说出版时程因此一定会拖长,增补内容也不免有品质上的风险,李女士仍慨然同意笔者的不情之

请,日后更建议以增订本的名义出版本书。对于李碧妍女士与上海中西书局的包容,笔者除了由衷的感激外,亦庆幸能将微薄的心得与既有成果作整合。希望这样的增补、调整既是对自己的交代,也可以是对读者的回报。

自从五年前接任行政职务以来,研究、读书的空暇已成奢侈,所剩下的只是一点牵挂学术工作的不甘心。《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增订本)能有出版的机会,不啻让笔者在尺牍公文之间,暂时寻得一线光明,得以再次掌握工作目标。付梓前几度翻阅书稿,乍觉本书已自成格局,脱离先前笔者所谓“英文专书‘前传’”的样貌。能有发行简体增订本的机会,一如早先自序里的谢词般,笔者要感谢许多机构与学界朋友的协助,没有他们的包容与热心,这本增订本怕是没有改写出版的机会。其中,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复旦大学高晞、张仲民两位教授的支持,笔者尤其感念在心。

刘士永

2016年7月序于南港

目 录

第一章 溯源与流变	1
一、武士刀：从武器到身份表征	13
二、西洋柳叶刀：从器械到精神	18
小结	23
第二章 交锋与转化	25
一、战国风云下的武士与金创外科的出现	25
二、从“兰医学”到国家医学	31
三、从技艺到学问	38
小结	42
第三章 名门与正宗	44
一、“二天一流”之一：医界的转型	47
二、“二天一流”之二：药界的演变	50
三、寒门仍无立锥地：野口英世的悲愿	55
小结	57
第四章 瑜亮之争	62
一、脚气(かっけ)的论战	63
二、从同窗竞争到医学派阀	69
三、鼠疫：明治医界的“严流岛之战”	77
小结	91

第五章 流转与离乡	94
一、日本明治医界内的师承系谱与新派阀	97
二、涟漪效应	100
小结	115
终章 弦尽音未竟	120
一、机械论下的西洋医学：在东亚的本相与皮相	120
二、尺八与望远镜：洋医精英的期待	123
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的社会角色与分类	127
四、师生伦常：从医家到医阀的基调	132
五、现代西洋医学里的东亚性？	137
【附录】 明治初年医界人物与系谱简览	143
参考书目	147

第一章 溯源与流变

武士(ぶし)是日本封建社会(约 10 世纪到 19 世纪)下的特殊产物,在称谓上也常以汉字“侍(さむらい)”作为其身份之表征。许多人认为日本武士是指一群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对于其因传统礼仪所随身佩戴的“刀(かたな)”,遂衍义冠以“武士”两字,成为中文“武士刀”一词的缘由。从 10 世纪发展而来的日本武士阶级,历经数百年寒暑变迁,逐渐在社会外铄与文化内炼的激荡下,形成了一套因应封建社会制度乃至崩坏的行为规范。“武士道(ぶしどう)”一词的创造,虽为明治时期以降美化日本精神文化的结果,但该名词迄今仍为学界争论之主题,显见其仍有一定描绘日本前近代社会特质的功能。大致来说,从者以武士道产生的历史约始于 19 世纪的幕府时代,当时封建社会早已脱离武力征伐的纷扰;承平日久之余,武士阶级的内部与文化出现职能分工及品味精致化的趋势。因此,至少到德川幕府中期,武士早已非当年的蛮勇之辈,阶级内部有着极为细腻的角色或职业分化,并成为此时幕府官僚体系中的关键基石。对于认为武士道存在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这时的武士虽然还保持着尚武、尊武的传统,但在儒学规范的“士道”影响下,他们在思想与行为模式上益发近似好礼问学的儒生,其所异者仅在于武士之世袭家业。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活跃的国际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亦出身于武士家族的新渡户稻造,为增进西方社会对日本之了解,恐是将武士道美化为日本武士固有精神文明的首唱。他在滞美之际将武士身份与儒道思想结合,于 1899 年发行英文版《武士道》一书,不仅对外为日本精神特质定调,对内亦满足东洋精神文明与西洋分庭抗礼之期望。该书初问市即在西方国家风靡一时,不论内外,率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经典代表。新渡户稻造在书中将日本武士比之于欧洲中古的骑士,但武士恪守的道德规范,

却是以儒学价值为主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规训。^① 惟批评随之在1912年出现,英国日本史家 Chamberlain 著书反对日本自古即有“武士道”一词的存在,但并不否定幕末的儒学化侍道是造成日本武士价值转化的重要事件。^② 就近年日本学界的研究来看,^③根据日本当时社会实态与对外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判断,新渡户稻造书中视为当然存在的日本“武士道”,或许只是一组透过比附西方历史,美化日本精神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在1957年古川哲史的专论中,即认为明治时代以降,世人与学界对于武士道的定义模糊、使用浮泛诚为一大弊端,但也指出武士道该用语“确实在那个时代也有一部分人使用着”。^④ 尽管新渡户稻造在书中视武士道为该阶级亘古不变的核心思想,但就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日本武士阶层如果确实存在某种文化内质的话,历经数世纪也绝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即使退而言之,《武士道》书中所欲呈现的武士面貌,即以江户末期的日本社会样态为基调;因此,所反映出来的德川幕末特征,亦不能视之为日本历史中武士阶级的全体实相。

姑且不论武士道一词,是否能真切反映日本武士的精神文化,但不论从新渡户稻造的本意,或是日后学界研究来看,该名词的确达到了凸显日本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赓续及递嬗的目的。相对地,今日医界汉洋二分的现况与东亚(含日本)医学史的书写,都习于将传统之汉方医与现代的西

① 新渡户稻造的原著,在1938年曾经矢内原忠雄整理出版,见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东京:岩波文库,1938);台湾最新之中译版,参见新渡户稻造著,林水福译《武士道》(台北:联合文学,2008)。

②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 (London Watts & Co., 1912).

③ 日本学界近年来的角度,似乎认为武士多数时期都是全无仁义、为战而战的一群人,长期以来都是文官儒生的反对者与对立面,甚至在明治时期有许多人站在反对西化的一方。从菅野觉明的著作来看,日本武士的传统行为模式有三大特征:一、本来以战斗为业;二、生活上形成含有妻子与眷属的特殊团体;三、行动目的在于维持私有领地并扩大生活地盘。三者无一可比拟新渡户稻造笔下优雅如儒生的江户武士;参见菅野觉明《武士道的逆袭》(东京:讲谈社,2004)。

④ 古川哲史《武士道思想とその周辺》第一章“序论”,收入相良亨编《国史大辞典》(东京:福村书店,1957),页4。古川简要点出武士道的思想、用语与历史实态间的扞格,该问题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解读与细腻的研究证实,参见谷口真子《武士道考:喧哗・敌讨・无礼讨ち》(东京:角川书店,2007)。

洋医分而述之。俨然因为医学分类之不同,汉医与洋医势为壁垒之两端。少数论及幕末洋学者或略涉其间之人物重叠,亦多以兰方医与汉方医之交流带过,鲜少将关系延伸至影响日本现代医学及其继承者。惟日本医学在历史阶段上,经历幕府到明治维新,在医学主流上由汉入洋,与武士道语汇与概念兴始之时间相叠,两者间是否有相近的延续与转化,诚属一值得深究之现象。

若从日本医家由汉入洋的历史演进来看,比较重要的倒不是武士道是否真实地长期存在,而是武士阶级的儒学化与社会沉降现象,此与幕末日本国内的社会、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德川幕府在17世纪末,曾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为解决因商品经济发达导致之士族阶层沉沦,江户幕府(1603—1868)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力行改革,重建了武家(幕府)政治的稳定性,吉宗以降的改革陆续提振了武士阶级内长期以来的角色分化,其中一个做法是引入中国儒学,稳定武士社会内部的传统价值,此举对之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发展颇具影响。易言之,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书所欲呈现的日本武士阶级精神特质,仅反映了德川幕府“享保改革”与之后“宽政改革”的部分历史现象以及明治时期知识精英的期待与对传统的想象。明治维新虽然为数世纪的幕府政治画上句点,但在社会价值与阶级的变化上,这场被视为日本现代化最重要的维新运动,却可能只是一个转折性的分号。^① 明治、大正社会所描绘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幕末士族,基本上也只能限于享保与宽政改革以后的日本武士阶级,在逐渐披上中国儒道中“士”的皮相后,亦将其传统社会规范以儒学语汇包装。^② 然以世代转换之角度来看,此时尤值注目的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

① 在政治上,也仍然有学者不认为明治维新有此巨变的意义。尽管对于传统幕府官僚体系运作的解释不同,简晓花《武士道与日本型能力主义》,《教育暨外国语文学报》第3期(2006),页76,仍指出:“时至明治,此旧有精神仍在,维新政府之官员组成亦以雄藩武士出身者居多,昔日之‘由下而上’之稟议制度亦随之被继承也存在明治之官僚组织运作当中。”

② 就此等日本18世纪知识分子“援儒入武士道”的工作,与其和明治维新知识界的关系而言,Susan Burns以“国体论”的产生为中心,有甚为深刻的讨论。她认为其中不仅涉及儒学思想的引入,更需考虑名词进入日本后意涵的转变甚至是新创。Susan Burns, *Before the Nation: Kokugaku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上,士族世袭的身份与职业,得以让共有的家风门规与士道价值,转换成日后之“专业(professionalism)”规范与伦理。是以,若就日本现代化之际的汉、洋医家而论,尽管传统武士刀与西洋柳叶刀在形制或功能上均大相径庭,但不论是幕末或明治时期同为持刀者之心性,却隐有灵犀相通处。

刀与道

据元木泰雄考证,武士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史书《续日本纪》所记载的奈良时代初期。^①然而此时的武士纯然是习武之人的简称,尚未成为身份或社会阶级的代名词。直到镰仓幕府成立之后,由于确立“御家人(家臣)”的政治制度,才把原本因征战自然形成的主从关系,以“御恩与奉公”的法律形式稳定下来,武士及其门风传统才逐渐成为幕府政治里的基本结构与官场价值。^②但此时武士的行为规范尚难称文明,而中国儒学的影响也极其零散与隐晦。

经历镰仓与室町幕府,武家政体不断从既有的武士传统与习惯,衍生出一套规范武士政治官僚的准则。据古川哲史的考证,约莫成书于17世纪前期的《甲阳军鉴》,是大量使用“武士道”一词的首例,该书还影响了日后两本建构武士道基本面貌的著作:《武道初心集》和《叶隐》。这些著作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以忠、义、勇三德作为武士道的核心价值。^③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初生的武士道虽借用部分儒学概念和语汇,两者却各自存在着复杂且巨大的传统约制,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有所对立的。此等既交流又对立的形式,也可见于后来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与西化论中的游移态度。^④简言之,武士道一词用法极多,内涵亦相当不稳定,与今日对于武士道美化后的样貌截然不同,或可谓武士道或儒学化武士社会是明治以

① 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页9。

② 邹萍《从武士道精神看武士道历史的演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页140。

③ 古川哲史《武士道的思想とその周辺》(东京:福村书店,1957),页6。

④ 佐伯真一认为所谓武士道根本就是在反公家(朝廷)与皇室尊重、反儒教与儒教、反西洋与西洋文化两两之间游移且举棋不定的群体;见佐伯真一《战场的精神史:武士道という幻影》(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页264。

降“发明”的传统。

尽管前述的武士道三德看来甚为勇猛阳刚,但或许是经历了长期战场上生死的无常,与幕府政治初期的夏虫朝菌,禅宗“死生一如”的思想东来不久,旋即渗入初现端倪的武士风尚之中:

禅宗否定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的境地,完全断绝生死羁绊,才能见性成佛之信念,呼应了镰仓、室町时代武士认为:临战应“忘我”、“忘亲”、“忘家”的三忘思想,因此被人认为是日后武士道中“死の觉悟”特质之源头。^①

尽管佛家对初期武士思想影响甚深,但对后代闻声救苦的日本医家而言,求生显然远比赴死更为重要,也因此凸显出武士行为规范儒学化趋势的必要。

1383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三将之一的斯波义将,笔书《竹马抄》训诫子弟,极言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分。对主君及亲长无条件的尽忠尽孝,在上位者的推崇与普及之下,成为室町时期期望规范武士阶层的道德准则,衍义所及还有“为主君献身”、“重名誉”、“重礼义”、“明身份”等强调“礼”与“分”的道德规范思想。^② 尽管此时中国儒学对室町时期的影响尚且浅薄,但有趣的是,日后被视为武士家训原型的《竹马抄》,其中部分语汇却有着和儒学词句相近的气味。以《竹马抄》在江户时代流通的情况而言,这些带有儒学意味的语汇,似为日后武士道与儒学的交流埋下接榫的伏笔。随着武士政权进入幕藩体制的高峰期——德川幕府,一个士、农、工、商身份世袭与社会阶级严明的时代后,之前以兄弟情谊维系的武士主从小团体,显然就必须顺应统御全国的政治趋势;借重新近传入之儒学,成为幕府日后一种惯见的统驭手段。德川时期的宽政年

① 刘毅《镰仓时代禅宗传入与武士兴禅》,《日本研究》第1期(1996),页38—44。

② 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编《武士道丛书》中编(东京:博文馆,1914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版),页506。当然,就现实的情况来说,武士仍旧是武士,弑君、犯上、手足/袍泽相残仍屡见不鲜。

间(1789—1800),江户幕府一则以流风所尚,二来也为巩固武德与官箴,遂以朱子学为正学,希望于士族规范为基调的社会伦理中普及儒学价值。^①江户时代中期以前,由于严格实施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的封建身份制,武士已逐渐失去战斗的主要功能与传统角色,成为武将身份的国家官吏或是坐食分俸的世家。从经营这样一个官僚国家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显然颇有助于政治上的管理,化武勇之辈为知所进退的国家官僚,这些工作无疑是江户儒学者的首要目标之一。

江户的古学派儒学家,同时也是兵学家的山鹿素行,致力于儒学武士道社会化,其《士道》篇认为当尽士道“使人伦之道遍布天下”^②,造成原本以奉公为媒介之主从间的情谊结合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制与官僚组织结构中的新式统治机制——具有儒生教养的武士。学者邹萍即认为:“这样的士,被赋予了类似中国封建官僚的社会责任,对主君尽忠不再只通过武力,更多的是要肩负起道德教化、安定社会责任。”^③山鹿素行将儒学具有普遍性人伦秩序的理念,全面应用到解释封建身份差异与世袭制度的合理性上,从“法自然”的角度,他认为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一样的人伦秩序,君上臣下、夫尊妻卑即是天地的道法。据此,山鹿在说明社会上下秩序绝对性的同时,也固化了武士的政治特权及社会位阶,使士族成为主君的左右手、社会伦理的指导者。儒学化的理想武士于焉形成,亦为后来创造武士道而铺路;武士的精神遂在此等影响下,被描绘成由既往“死的觉悟”过渡至“道的自觉”。^④于是,在《山鹿语类》中,武士被比拟为儒教之士君子,从而强调实现五常之德。然山鹿素行坚持武士具有尊重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认为“本朝传自天照大神,帝国世系正统至今未曾改变”^⑤,显与中、朝诸侯乱政造成皇朝兴替不同;并进

① 辻本雅史著,田世民译《谈日本儒学的“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纪为中心》,《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3:1(2006),页257—259。

② 田原嗣郎《日本の名著 12 山鹿素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页225。

③ 邹萍《从武士道精神看武士道历史的演变》,页141。

④ 船津明生《明治期の武士道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新渡戸稻造“武士道”を中心に—》,《言叶と文化》第3卷(2003),页20。

⑤ 岩波书店编《山鹿素行 日本思想大系 32》(东京:岩波书店,1970),页333。

一步强调日本武士道已为儒学正宗甚至促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洋儒学重心。^①他这种儒学正统因势移转的理解,在尔后日本洋医正统之争时亦有迹可循。其次,山鹿所谓“诚”来自“不得已”的说法,^②似乎也在20世纪初期医界派阀争斗中弟子随师尊共进退的集体行动里获得呼应。

不过,诚然江户时代的武士社会与政治吸收了许多儒学语汇与价值,但若将其时代的文化特质都只用儒学来理解则过于单纯,日本社会特有的某些行为与价值,如公私观念与家(イエ)制度依然左右着士族阶级与旁出的侍医家门乃至日后的洋医学者。

儒、医并侍：幕府末年的医家

同值儒学成为江户社会思想主流之际,封建阶级社会却在德川中期以后面临崩解,武士虽有华名却未必能享其实,学儒与经商遂为维系生计的较佳选择。因此,一批以儒为业的武士乃被卷入江户儒学的流派之争,而以医维生的武士阶级也产生近似的流变,在江户末季形成儒、医同转的特色。尽管明治以降洋医兴起,表面上儒学不再是医学伦理与专业之规范来源,但因此时日本医家援汉入洋的历史渊源,某些儒学化的士族行为特质规范与幕末社会的价值观,在洋医为主流的时光里依然延续到1930年代前后。

日本儒学就学界通说,在江户晚期约可区分为三派: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古学派。其中朱子学在宽政改革后成为幕府官学,但其内容亦不断有所演变。^③根据严绍溥的研究,虽说日本阳明学派系出朱子学,然其更

① John Allen Tucker, "From Nativism to Numerology: Tamaga Soko's Final Excursion into the Metaphysics of Chang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 2(2004), pp. 195-196 and 207. 有关山鹿素行如何定义华夷之别并化日本为华夏的最新讨论,可参考前田勉《山鹿素行“中朝事实”における华夷观念》,《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编)59号(2010),页47—54。

② 对此点的理解,借用自藤井伦明《“诚”在日本的变貌——由朱子之“诚”与山鹿素行之“诚”谈起》,《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5卷第2期(2008),页26。

③ 以朱子学的实虚之辨为例,朱子学以佛学为虚、己为实,故视日后兰学中的基督教为虚妄,但此时已有学者企图调和神道与官学的对抗。是故明治维新派人士反倒以阳明学为实学,挑战朱子学的“虚”。见严绍溥《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页104。